●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萬里護寶 賡續文脈

近兩萬箱文物避寇長征十餘年 堪稱人類文明存續壯舉

故宮百年文物南遷 上篇

編者按

日寇侵掠、山河破碎的危難關頭，一眾故宮人，以「文物比命重」的信念，在廣大軍民的支持下，創造了中國護寶長征近乎「零損」的奇跡，成就了世界文化保護史上的壯舉，為人類文明存續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6年2月5日深夜，第一批2,118箱故宮文物從午門離開，兩日後從火車站啟運南遷上海、南京。司機和人力車夫胸前都貼着一枚「吉」字徽章，寄託着人們對文物南遷的吉祥期盼。這一刻，沒有人能預卜前路順逆，但別無選擇。

1933年山海關淪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議決定將文物精品南遷，以避日寇劫掠。由故宮博物院牽頭，將本院13,427箱又64包文物，及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處6,065箱又8包8件文物分批南遷。1937年，南遷文物又分南、中、北三路西遷疏散到西南貴州、四川、陝西等省，歷時十餘年，這些文物行程數萬里，輾轉大半個中國，堪稱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物遷徙。

這是故宮博物院的一段崢嶸歲月，是中華民族文化抗戰中的一部史詩。「這些承載着中華文化血脈、傾注着中華民族感情的故宮文物，在民族危難時刻，與中國人民共同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也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如是說。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孟冰、周志彬 北京、重慶、台北 連線報道

●1933年山海關淪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議決定將文物精品南遷，以避日寇劫掠。圖為文物箱件集中太和門廣場。

●1947年，抗戰勝利後，故宮文物西遷三路人馬齊聚重慶。圖為大夥兒一起去重慶南溫泉旅遊。第一排右三為南路負責人莊嚴（手抱為兒子莊靈）。 莊靈供圖

時值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北京、至重慶、赴台北，採訪故宮人及親歷者後代，推出系列跨版專題，依循故宮文物南遷路線，回溯艱苦卓絕的護寶征途，重溫蕩氣迴腸的烽火記憶，解碼典守中華文化的精神圖騰，勾勒兩岸攜手賡續華夏文脈的美好願景。

與戰歐美國家保護文物相比較，中國動手早。」鄭欣淼說，1939年9月二戰爆發前後，歐洲各國博物館着手進行文物轉移，美國、蘇聯是在1941年受到德軍、日軍攻擊後才開始文物檔案等的安全轉移。在中國，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故宮博物院即醞釀進行故宮文物動遷。

篩選文物首重價值

據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檔案館（院史陳列館）副館長徐婉玲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介紹，故宮博物院首批南遷文物優先考慮古籍和書畫，而古物陳列所則採取重要文物遷走一半，留下一半用於展覽的方式。「故宮文物篩選工作持續了約一年時間，數量龐大且考量因素眾多。早期重點關注重要文物，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會審查、研究並整理。例如，古籍中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等為代表，這些古籍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是重點保護對象。」她說。

雖然沒有明確的標準，但專家們會憑借專業知識和對文物價值的深刻理解進行挑選。「時任古物所副所長馬衡先生從金石學的歷史價值和文物的珍稀性出發，堅決主張石鼓南遷，儘管石鼓的打包裝箱極為困難，輾轉運輸也極為不易。」徐婉玲指出，這批中國現存最早的先秦石刻，每個重約一噸。當時還請了古董舖裏有經驗的經理親自打包，足見對文物保護的重視。

千斤石鼓細緻包裝

徐婉玲提及的石鼓，遠在台北的莊靈老先生，亦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特別提起。莊靈的父親莊嚴，在文物南遷啟動時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第一科科長。「第一批箱件運走後……有一天，我忽然收到院長的密令，要我去安定門內國子監將兩塊石鼓裝箱……這真是一件晴天霹靂，既重大又困難的課題。」

石鼓重，且「時間久遠，石皮和石心已逐漸呈剝離之狀，稍有不慎，文字石皮就會碎落」。莊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請教老友、收藏家霍保祿先生。在石鼓包裝之前，先要用極薄極軟的棉紙蘸水浸濕，然後用鑷子把濕軟的棉紙塞進石鼓的裂縫裏。這樣一字一字一鼓鼓地逐件工作，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全部完成。

艱難跋涉壯烈犧牲

中國文化史上，一段波瀾壯闊的「長征」開始了。

「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原處長梁金生的一家，見證了抗戰歲月中故宮文物南遷的長途跋涉。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梁金生的爺爺梁廷燦從清朝宮廷書師轉為工作人員。抗戰爆發後，爺爺被指派押運文物，負責其中最為艱險的北路，過秦嶺時險遭翻車，途經漢中時遭遇過日軍的轟炸，過大渡河時曾經落水，最終護送文物平安抵達四川。

1939年4月，隨着日軍對重慶的轟炸日益加劇，西遷中路文物被迫再次向樂山轉移。為趕在長江豐水期結束前將文物運抵樂山，故宮人在重慶南岸區的玄壇廟獅子山連夜裝載。昏暗中，年僅32歲的故宮文獻館職員朱學侃失足跌落，成為護送國寶犧牲的第一人。故宮文物西遷中路主要負責人歐陽道達曾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一書記錄下這段悲壯的故事：「當轉運至十四批，在南岸玄壇廟裝運第三庫文物時，朱君先往視察艙位，布置搬運。時以曙色微茫，艙尚昏暗，朱君心切布置，未遑察覺覆蓋艙板已啟，失足踏虛，身墜艙底，重傷腦部，不省人事；急速送往玄壇廟附近仁濟醫院，已不及營救而氣絕。殮後一日，葬君於南岸獅子山，為立碑焉。」

輾轉水陸驚險連連

1937年8月14日，存放於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80箱故宮文物，在莊嚴等人押運下，從南京搭載輪船招商局的建國輪，溯江西上，到達漢口再從陸路轉運至長沙，入藏湖南大學圖書館底層。故宮博物院曾打算在岳麓山下構築一個既能防空襲，又防潮的堅固石屋，來存放南遷長沙的80箱故宮精品文物。然而，石室還沒建成啟用，從1937年11月中旬起，長沙就開始遭受空襲。莊嚴等人再次押運文物啟程，於1938年1月12日離湘，經廣西輾轉前往貴陽。

1938年4月10日下午14時許，日軍出動27架飛機對長沙進行第4次轟炸，投下了大量的燃燒彈和爆炸彈，導致湖南大學圖書館被徹底摧毀，變成一片廢墟，僅剩4根被炸斷的石柱。若非故宮人及早轉移文物，後果不堪設想。

至1947年6月，故宮南遷文物全部東歸南京，1948年部分運往台灣，大部分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返回北京。無論是持續時間、轉移空間廣度，還是保護數量及難度，歐洲各國的文物轉移，都與故宮文物南遷不可同日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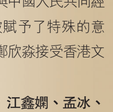
壯舉化作前行動力

「幾乎人世間的所有艱難，包括戰亂、饑饉、疫病、大自然的災患、官僚系統的骯髒腐爛等等，都一股腦兒地拋到他們的世界裏，沉甸甸地壓在他們身上，要他們屈扛起來，也反過來映襯了他們的偉岸。」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作家祝勇在《故宮文物南遷》後記中寫下這段話。他告訴香港文匯報，籌備寫作的兩年多時間裏，他在查閱文獻、採訪南遷人員後輩與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重構那段不平凡的歲月，「這次寫作的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動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宮文物南遷，也不再只是靡封在文字檔案裏的一段歷史，而成了我們前行的動力之源。」

「故宮是一部濃縮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在鄭欣淼看來，這段歷史凝結着超越器物之上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彰顯了民族危難之時的團結偉力。故宮文物南遷及其基本完整保存，是中國人民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偉大壯舉，「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來看，故宮文物南遷的壯舉和成就，是對人類文明存續的偉大貢獻。」

●香港故宮館展出的文物南遷箱。

●存澳文物點收清冊。網上圖片


●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檔案館（院史陳列館）副館長徐婉玲

掃碼睇片

南京—重慶—長沙—貴州 執着的山洞庫房計劃

掃碼睇片

特稿

重慶南濱路旁，故宮文物南遷紀念館靜靜地立於江風樹影之間。年過七旬的胡昌健就住在不遠處，常獨自乘公交車前來看看。他拄着枴杖，一步步踏過蜿蜒的石階，走得很慢，卻穩。

重慶山坡尋遺址 找到國寶堆放處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胡昌健於日文檔案《故宮七十星霜》中接觸到一段文字：「1938年5月，9,338箱文物安然抵渝，分存於川康銀行、安達森洋行等倉庫……」這幾行字，揭開了一段被歷史掩埋的秘辛。身為博物館工作者的胡昌健，決意撥開歷史塵埃，尋找這幾處國寶堆放處：「我想把故宮文物南遷與重慶有關的事搞清楚。」

1997年，他與時任重慶南岸區文管所所長戴月英踏上尋訪之路。書中記載：「獅子山安達森洋行倉庫，位於重慶南岸玄壇廟附近，是沿山坡建造的四棟倉庫」。那時的重慶尚無南濱路，兩人沿玄壇廟舊址海獅路的山坡一路向下尋去，於荒坡廢棄工廠深處，發現一扇緊閉的院門。

胡昌健掏出口袋中的介紹信，推門而入，迎接他的是狼狗的狂吠聲。胡昌健後退了兩步，隨即他望見了命運的皺瞬——青石階梯蜿蜒而上，四棟灰瓦倉庫層疊於山壁，「這就是書中『沿山坡建造的四棟倉庫』景象了，地點、相貌全部脗合！」胡昌健又驚又喜，安達森洋行仍在，那時已成為重慶商業儲運公司的廢棄倉庫，狼狗是庫房工人養來看門護院的。

藏身中立國企業 日軍來時免遭殃

在植物的掩蓋中，胡昌健留意到一條寬僅不足1米的纜車軌道——「當年船舶停靠在慈雲寺長江邊，要將裝箱文物搬進洋行倉庫，是用纜車將箱子向上牽引運至倉庫門口，再搬進庫房的。」

安達森洋行，是瑞典商人安達森在1891年建造的倉庫，文物南遷時，故宮博物院租下其中4間，安達森安排「把倉庫裏的臘肉都扔了」，將3,694箱文物搬進了倉庫。南岸區文管所內至今還留存着已經過世的老人張建民口述的故宮文物保護過程的紀錄，他生前曾是安達森洋行公私合營後的第一批員工。他說，曾聽當年洋行的老同事們提及，每當日機來轟炸時，安達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國旗在洋行門口的旗杆上升起，再將屋頂鋪上代表中立國的瑞典國旗，以求安全。

時任院長的堅持：山洞最安全合適

在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山洞庫房計劃」始終貫穿其間。從南京到重慶，再到長沙、貴州，這一路上的山洞庫房選址，不僅承載着文物的安全，更見證了當年故宮人在戰爭陰霾下對文物保護的執着堅守。

「先生們雖非建築師、地理學家或科學家，但他們以文科生的視角、文化人對文物保管重要性的傳統認知，竭盡全力為文物挑選安全合適的保存地。」徐婉玲表示，西遷初期，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心中就始終懷揣着為文物尋找山洞保存的想法。

在南京時，建築保存庫的工程委員會決定在冶山附近建造秘庫，就已具備強烈的防空意識與戰略戰備警覺。在長沙，他們在嶽麓書院旁開鑿山洞準備存放文物。然而隨着當時戰局的急轉直下，這批文物只能繼續西遷。到達貴陽後，他們繼續尋找山洞，幾乎將貴陽附近的山洞考察了個遍，最終選定安順的華嚴洞，洞口寬敞，地理位置距貴陽也不遠。

即便文物遷移到了台灣，這一理念依舊延續。故宮文物從基隆上岸後，先到台中糖廠，再到台中的霧峰北溝，北溝同樣有山洞庫房。現在的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有山洞庫房。

如今，當人們回望這段歷史，南京、重慶、長沙以及安順等地，這些故宮南遷文物的存放地，已不僅僅是文物的庇護所，更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鮮活教材。徐婉玲介紹，一些當年文物的保存地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利用。例如，重慶安達森洋行通過修繕改造，成為重慶故宮文物南遷紀念館；安順華嚴洞雖經歷建設變化，但天然山洞得以保留。

●貴州安順華嚴洞臨時庫房復原示意圖。

●胡昌健15年來探訪國寶南遷舊址重慶安達森洋行。

●安達森洋行上世紀九十年代舊景。

●故宮文物東歸時，匯聚重慶，暫存於安達森洋行。圖為當時文物運上山的軌道，現已鋪滿青苔。 莊靈供圖

文物南遷西遷路線

路線1：文物南遷（北京→上海→南京）
路線2：西遷南路（南京→巴縣）
路線3：西遷中路（南京→樂山）
路線4：西遷北路（南京→峨眉）

故宮文物南遷西遷北返時間線

- 1933年2月7日至5月23日，13,427箱又64包故宮文物分五批運往上海
- 1936年12月8日至21日，存澳文物分五批遷轉南京朝天宮保存庫
- 1937年1月1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 1937年8月，南京形勢日趨緊張，南遷文物緊急向後方疏散，再度避敵西遷。分南、中、北三路，輾轉經貴州、陝西、湖南等地短暫存留後最終遷至四川省的巴縣、樂山的安谷鄉及峨眉縣等處存放
- 1947年5月，開始分陸路、水運兩路將全部文物遷運至南京保存
-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2,972箱故宮文物分三批遷移台灣
- 1950年、1953年與1958年，6,254箱文物分三次運回北京，還有部分文物留存於南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1938年，漢中至成都無橋可通，圖為由木船載着裝運文物的卡車渡河情形。

南遷展明在故宮揭幕 「文獻+文物」立體講故

「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將於9月30日在故宮博物院神武門展廳亮相。徐婉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23年底首場「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在上海展出，今次展覽是在上海展覽的基礎上增加「文獻+文物」的展陳方式，通過南遷文物和關聯文獻，讓觀眾欣賞這些經歷戰爭歲月仍然完好的珍貴文物，同時了解文物南遷的艱辛曲折，感悟和平的來之不易。

「在展覽策劃過程中，學術性與大眾傳播的平衡成為重要考量。」徐婉玲介紹，由於南遷文物品類豐富，策展團隊精心挑選，力求展現文物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文物與檔案文獻之間的關聯。例如，展覽選取了一組清代宮廷畫家董喆的花卉軸，團隊根據圖軸中所繪器物，再從南遷瓷器中擇選器型相似者，配以淡雅的龍泉窯梅瓶、鮮艷的蝠紋葫蘆瓶和掐絲琺瑯蒜頭瓶等。將南遷文物中的三件掛軸和三件器物同欄展出，畫中器物與現實中的器物並列，便有了一種觀賞的聯繫。觀眾走進展廳，不僅可以進入文物南遷的特定情境，也能感受到文物在清代宮廷中的昔日風采。

期待有機會赴港展出

徐婉玲透露，未來將繼續推進文物南遷的歷史敘事和南遷文物的展覽展示，通過巡展和數字展覽等形式，擴大文物南遷故事的影響力。目前，故宮博物院正在籌備與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聯合舉辦南遷文物展，同時將展覽送到四川成都等與文物南遷有關的城市，期待有機會赴港展出，與香港青年和民眾交流。

數字展覽方面，策展團隊計劃以場景和故事的方式演繹文物南遷，若獲得資金支持，將在故宮之外尋找空間落地，讓民眾通過數字技術走進這段歷史，了解文物故事。